

從新冠疫情看風險社會

■ 蘇 紅

2020年開年受到全世界最高關注的詞匯一定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消息先是在微信群裏隱約閃現，進而權威人士出面確認，再到武漢封城，最終迅速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這一場始料不及的疫情，從武漢輻射到中國各地及世界許多國家，在極短的時間裏，打破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節奏，擾亂了中國以及世界多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運行秩序，並且已經和正在改變許多人的生命軌跡。疫情仍在肆虐，此時做任何結論性的評說都過於草率，但是，僅從已經發生的種種現象，試著做一些社會學的分析，也未嘗不可。

早在1986年，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他在出版的《風險社會》一書中指出，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的發展，全球性風險對人類社會造成巨大挑戰。它是現代化自身製造的，它不是地方性的，而是世界性的。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進一步闡釋了風險社會的機理，提醒人們隨著不確定因素的頻繁出現，風險社會的公民需要根據規避風險的原則來組織社會，其目的是規避人為風險和追求安全的社會。風險社會理論自此成為學術界廣泛關注的課題，並引發了相當深刻的討論。目前這場始於2020年初的新冠病毒疫情，無論從其風險特性，還是風險傳播的速度及廣度，以及對全世界人類生活造成的影響，無一不讓人聯想到「風險社會」這個概念，因此將風險社會這一原本抽象的理論，來觀察和分析這場具體的病毒疫情，可以發現，它的確在現實層面上對全球化與風險社會進行了生動的印證。

風險意識的啟蒙

在我們傳統的思維中，風險是對正常生活的破

壞，人們因風險的不可預料性而產生恐慌，又因為對風險的應對措施的不足或失當而產生憤怒、抱怨和沮喪，當面對一場突如其來的風險，深受其害的人不免有一種世界末日到來的絕望。這是人們對風險社會的普遍性認識。然而風險社會理論透過這種一般的認識，進入到一個更深層面的理解，人類未來社會其本質就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不可計算的不確定性在造成混亂或災難的同時，也有可能成為創造性的一個來源，亦即成為允許意外情況和實驗新事物的理由。當然，這種預設的前提，一定是全社會對風險意識的啟蒙，即充分瞭解和理解當今社會風險的常態化，並有充分的知識和技術上的準備來應對風險，進而在社會機制的各個層面將風險意識整合進既有的、常規化的管理活動之中。

以此次新冠疫情為例，它和2003年席捲世界的非典疫情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時隔區區17年的時間，疫情再次在中國爆發並影響世界。可以預見，這次的新冠疫情既不是首次，更不可能是最後一次，人類必將與各樣的風險共生共存。因此，當人類經歷了一場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與其高聲歡呼，慶賀勝利，誇大人類「戰勝」災難的能力，不如認真踏實地檢討從政府到個人在應對災難時有哪些成功的經驗，還有哪些方面需要改進，以便在面對不知何時遲早會到來的下一次災難時，無論是政府、群體，還是個人，能夠更加從容一些，更加智慧一些，更加理性一些，也更加人性一些。

風險意識的啟蒙不僅僅是一個理念，更加是一系列的實際操作。比如，在學校教育的內容中增加風險知識的灌輸和應對風險的演練，日本小學生針對地震災害的持續的不間斷的訓練，使得在地震真正來臨時，從老師到學生都能理智有序的行動，

這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考。社區、媒體等公共信息的宣傳，也是風險意識啟蒙的重要手段。比如，在此次疫情擴展到加拿大之初，加拿大政府反復強調，防備疫情的最佳方法不是戴口罩，而是勤洗手。加拿大衛生防疫部門對於洗手的重視不僅限於在幼兒園教導孩子，而且在幾乎所有的公共衛生間的洗手池上方都貼有圖文並茂的如何洗手的分解程序，這種簡單的持續的衛生習慣的宣傳教導對防範風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外，抗風險技能的培訓也是必要的裝備。在加拿大，緊急救護證書（First Aid Certificate）課程共有三級，根據工作單位僱傭的人數，工作場所離醫療機構的距離，以及工作單位危險性的程度，要求職員必須具有相應級別的證書，才能工作。每一個食品行業中也必須有一個主管須持有食品安全證書（Food Safety Certificate），該證書每5年需要經過考試更新。所有這些具體的措施，都是將風險知識和應對技術整合進普通的職業技能中，幫助公民瞭解風險，提高風險意識，強化抵禦風險的能力。事實證明，當一次危機發生後，人們學習和瞭解風險的意願是強烈的，正是積極推動風險意識啟蒙的大好時機。

世界主義化

按照貝克的理論，全球風險的一個主要效應就是它創造了一個「共同世界」（Common World），一個我們不得不共同分享的世界，一個沒有「外部」、沒有「出口」、沒有「他者」的世界。此次的新冠病毒大爆發，使人們切實地體驗了一個「共同世界」的存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病毒從武漢爆發，已經跨洋過海，正在攪動整個地球，不消說亞洲，遠在北美洲、歐洲，甚至非洲的人們，已經每日在感受由它輻射而來的恐懼和不安。隨著抗疫行動，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如口罩的短缺，中國不但消耗掉自己國家的庫存，而且由於世界各地的中國移民發起籌募活動支援中國，致使北美、歐洲的口罩幾近脫銷。更為嚴峻的是，由於全世界的口罩生產主要集中在中國，因為疫情工廠停工停產，導致口罩供應全線告急。這意味著通過全球化而產生的整個世界的相互關聯性和相互依附性，正在以一場疫情的方式影響著所有人類的經驗

和實踐。按照貝克的分析，這就是所謂「世界主義化」。

用「世界主義化」的框架看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當武漢開始爆發時，全中國人民將武漢人當作「他者」，對武漢人圍追堵截，無所不用其極。有些在封城之前出外旅游的武漢人，封城令一下，既回不了武漢的家，又在旅遊之地因為武漢身份而被旅店拒之門外，一夕之間成為流浪人群。但是，隨著病毒迅速在中國各省擴散，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中國人成為「他者」，各國停飛航班、撤僑、隔離等消息，每天層出不窮，應接不暇。不幸的是，沒過多久，病毒在不同洲出現，各自搭上飛機郵輪火車汽車，一路狂奔到世界各國。可以說，病毒創造了一個共同的世界，終結了「全球他者」，或者說，他者就是我們，我們就是他者。由此可以看到，在世界風險社會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當風險來臨時，人們不管願不願意，都被強制性地囿於「世界主義化」的空間之下。對「世界主義化」的認識，可能對我們是一個契機，即以超越國家邊界和民族衝突的視角看待我們所生活其中的風險社會，在共同應對風險的實踐中改造舊有的制度，創建新制度，努力開拓國際化視野，並嘗試建立跨國網絡。使無論是政府還是組織，抑或是個體，都能夠跳出地域、國家、種族的框架，更加具備全球視野和姿態，以應對全球風險。

風險給社會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如此次新冠疫情造成經濟停滯，生產和服務中斷，信任關係裂斷，公眾心理恐慌和緊張等等。但是，既然風險不可避免，如果各國政府能夠對處理風險時的經驗教訓進行認真的總結，合理的評估，借助這次疫情災難，有效地改進政府管理能力，使治理更加完善，預備面對下一次風險時，有更大的信心，這也不失為將風險引發的損失和災難，轉化為變革、發展和創新的動力的難得的機會。面對未來必不可免的種種風險，政府和人民一樣任重而道遠。

作者簡介 蘇紅：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研究項目主管，現為《文化中國》編委會委員。